

明清小说的文化批评

(明代卷)

曹 萌 著



研究出版社

明清小说的文化批评

(明代卷)

曹 萌 著

研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小说的文化批评/曹荫著.—北京:研究出版社,2001.6

ISBN 7-80168-013-8

I. 明... II. 曹... III. 小说—文学评论—中国—明清时代 IV. I207.

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3350 号

书 名	明清小说的文化批评(明代卷)
作 者	曹 荫
出版发行	研究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沙滩北街 2 号(100727)
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
责任编辑	傅旭清
封面设计	张次第
印 刷	山东省章丘市第二印刷厂印制
版 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82 千字
印 数	0001-3000 册
书 号	ISBN 7-80168-013-8
定 价	22.6(元)

目 录

序.....	(1)
绪论.....	(5)
第一章 洛学传承与明代通俗小说创作倾向的嬗变	(16)
1. 引言	(16)
2. 洛学传承与通俗小说创作倾向的嬗变	(17)
3. 洛学鼎盛期与通俗小说的载“理”倾向	(19)
4. 理学复兴期与明初通俗小说创作倾向	(23)
5. 理学叛逆期与明代后期通俗小说的世俗化倾向	(26)
6. 复兴古学期与明末通俗小说的尚劝戒倾向	(28)
第二章 中国古代贵族风度与明代通俗小说战斗描写模式	(33)
1. 引言	(33)
2. 贵族风度的产生	(34)
3. 古代贵族风度的表现及其特征	(35)
4. 贵族风度的嬗变与消失	(43)
5. 贵族风度对明代通俗小说战斗场面描写的影响	(44)
第三章 明代通俗小说的教育倾向	(49)
1. 引言	(49)
2. 古代通俗小说教育倾向的文化基础与基本表现	(50)
3. 古代通俗小说教育倾向的文体原因	(52)
4. 明代通俗小说体现教育倾向的主要形式	(56)
5. 明代通俗小说教育倾向的基本内容	(59)
6. 结语	(63)
第四章 明代社会思潮的发展与小说色情描写的嬗变	(65)
1. 引言	(65)
2. 明初及明中后期描写色情的小说之概况	(67)
3. 明末描写色情的小说之概况	(68)
4. 明代社会思潮与小说的色情描写	(70)
(1) 明初理学思潮对描写色情的小说情节布局之影响.....	(70)
(2) 明中后期叛逆思潮对描写色情的小说情节布局之影响.....	(71)

(3)明末“复兴古学”思潮对描写色情的小说情节布局之影响	72
(4)明末士人的社会地位及观念在小说描写色情中的作用	76
(5)明末士人对情的矛盾态度在小说描写色情中的作用	79
(6)明末实生活在小说描写色情中所起的作用	82
(7)明末描写色情小说的结构模式之理论自觉	85
(8)明末描写色情小说的结构模式之价值意义	87
5. 结语	88
第五章 明代言情小说的功用思想	92
1. 引言	92
2. 以言情小说为自我抒解的功用思想	93
3. 反礼教、尚自主爱情的创作倾向	95
4. 藐视封建礼教和高情欲的创作倾向	96
5. 倡导“情教观”与以情为教的创作倾向	99
6. 提倡爱情至上与主张男女平等的创作倾向	102
7. 结语	105
第六章 《庄子》文学形象对明代通俗小说的影响	107
1. 《庄子》文学形象的产生	107
2. 《庄子》文学形象的基本类型	111
3. 《庄子》塑造文学形象的方法	115
4. 《庄子》文学形象的体系	117
5. 《庄子》文学形象对明代通俗小说的影响	118
第七章 古代士人的自传与明代自传体小说	123
1. 引言	123
2. 自传体小说的渊源	124
3. 士人自传向自传体笔记小说的嬗变	125
4. 明末自传体笔记小说	127
5. 明末自传体笔记小说对清代自传体小说的影响	128
6. 明末自传体笔记小说对现当代自传体小说的影响	132
7. 结语	133

第八章 明代商业思潮与“三言”“二拍”	(135)
1. 引言	(135)
2. 商业思潮的主要表现	(136)
3. 印书业的繁荣	(138)
4. 市民阶层文学要求的出现	(139)
5. “三言”“二拍”产生过程所体现的商业特征	(140)
6. “三言”“二拍”中的商业意识	(143)
7. 结语	(149)
第九章 明代包公小说对元代包公剧的继承与超越	(151)
1. 引言	(151)
2. 历史真实中的包公	(152)
3. 元杂剧中的包拯形象	(157)
4. 明代包公小说对元代包公剧的继承与超越	(159)
5. 包公文学形象的文学史价值	(162)
第十章 《三国演义》的反衬艺术与关羽性格的嬗变	(164)
1. 引言	(164)
2. 《三国演义》的反衬手法	(165)
3. 关羽性格的嬗变	(171)
4. 《三国演义》反衬手法与关羽性格嬗变的成因	(182)
第十一章 《三国演义》的《史记》笔法	(185)
1. 引言	(185)
2. 《三国演义》中的“互见法”	(187)
3. 《三国演义》中的寓论断于叙事	(192)
4. 准拟“成一家之言”与“笔则笔、削则削”	(196)
第十二章 《三国演义》的人才思想与英雄观	(201)
1. 引言	(201)
2. 建立在英雄观基础上的人才思想	(203)
3. 对“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的艺术再现	(209)
4. 艺术表达所体现的人才思想	(212)
第十三章 《水浒传》:尚侠思想的遗传与变异	(217)
1. 引言	(217)
2. 释“游侠”	(218)

(1) 游侠的道德操守与精神气质	(219)
(2) 尚侠思想的文学表现	(223)
3. 《水浒传》中的尚侠思想	(227)
(1) 塑造出一批游侠形象	(227)
(2) 表现出天真、乐观的人生态度	(229)
(3) 以夸张和想象塑造人物	(230)
4. 《水浒传》: 尚侠思想的变异	(232)
第十四章 《西游记》的创作模式及其小说史地位	(234)
1. 引言	(234)
2. 韵散相间的叙述模式	(237)
3. 场面重复描写模式	(241)
4. 运用反讽技巧的模式	(243)
第十五章 《金瓶梅》张扬色情的倾向与性文化的小说表达	(248)
1. 《金瓶梅》的问世与小说的家庭描写	(248)
2. 《金瓶梅》张扬色情的倾向	(250)
3. 性文化与小说描写	(258)
4. 《金瓶梅》色情描写的文化意义	(261)
第十六章 社会风尚与明末婚恋小说结构程式	(266)
1. 明末婚恋小说推进式结构程式及其艺术成因	(267)
2. 明末士人的尚情风气与推进式结构程式	(274)
(1) 士人的崇情态度	(274)
(2) 士人尚情的生活风貌	(277)
(3) 士人爱情至上的价值观	(279)
3. 士人生活风貌在推进式结构程式形成中的作用	(281)
4. 明末女性婚爱意识与推进式结构程式	(282)
(1) 女性择偶意识的加强	(282)
(2) 女性择偶观被小说家接受	(286)
5. 小说家人格理想在推进式程式形成中的作用	(289)
6. 结语	(290)
主要参考书目	(294)
后记	(297)

序

自1994年曹荫离开南开大学以后，我们就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师生情谊。去年春天，他写信告诉我，说要去郑州大学，并征求我的意见，我很赞同他的选择，于是加以鼓励。果然成行之后，他又写信告诉我，说准备给元明清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开一门“明清小说的文化批评”课程，请我提提意见，我觉得很好，就鼓励他开出来，想不到，事隔一年，他就写了这样一本名为《明清小说的文化批评（明代卷）》的书稿，送我改正并请我作序。

我详细地看了书稿中每一章的摘要，又看了其中大部分内容，觉得很有见地，提出了许多新鲜的命题，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于是同意给这本书写序，并乐意将它推荐给学界同行。

曹荫同志可以说是我的学生。大约十年前，当他的导师罗宗强先生领着拘谨的他来我家，请我在小说资料方面给予指导的时候，我就对曹荫有了很好的印象。果然，毕业不久，他就在齐鲁书社出版了其博士论文《明代言情小说创作模式研究》，而且，该书的序作者是国内著名的小说研究专家袁世硕教授。曹荫同志在南开读书是非常不易的，这在他那本书的后记中有所描述，但他终于克服了困难，取得了进步。现在他又出版了三本著作，其进步之快，实在令我高兴。

《明清小说的文化批评（明代卷）》是曹荫同志在给研究生授课的基础上拓展而成的，仅从这一形成原因看，该书所持就的学术标准是很高的，所选择的研究角度也是新的。

对于明代的小说，除了既有的小说史、小说理论史从特定的角度进行过系统的考察描述外，较为系统的著作还是比较少的，尤其是从文化批评的角度进行特定的研究更为稀少。曹荫的这本书，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填补了某些方面的学术空白，也一定程度地开拓了古代小说的研究领域。

本书以考察传统文化、社会思潮、士人心态、士人生活风貌等文化背景为基点，重在研究这些外部因素与明代各种题材小说的思想倾向和艺术倾向的关系。这是一个既新且难的角度，课题的学术价

值应该是值得特别肯定的。

将文学现象植入大的文化环境,如传统文化、社会思潮等背景上进行文化研究,这是比较大的学术工程,它需要较为充分的学术准备,易言之,如果没有文化学、哲学、史学以及社会学等方面的理论基础,是很难展开这类课的。曹萌同志知难而上,勇于向这一领域进发,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当然,更值得重视的是,这本书所体现出的下面一些学术特点。

首先,本书所涉及的命题,具有相当的学术深度和广度。《明清小说的文化批评(明代卷)》大致提出了十几个较大的学术题目。这些问题,有的在学界曾有过研究,但尚不深入,曹萌同志在此基础上又掘深了一层;而更多的是未曾有人提出的学术问题。如:洛学传承与明代通俗小说创作倾向的嬗变;中国古代贵族风度与明代通俗小说战斗描写模式;明代通俗小说的教育倾向;明代社会思潮的发展与小说色情描写的嬗变;《庄子》文学形象对明代通俗小说的影响;古代士人的自传与明代自传体小说;明代公案小说中包公对元杂剧中包公的继承与超越;《三国演义》的反衬手法与关羽性格的嬗变;《水浒传》:游侠思想的遗传与变异;《西游记》的创作模式及其小说史地位;《金瓶梅》张扬色情的倾向与小说的性文化表达等。就学术研究而言,能够提出这些问题已属不易,何况再加以特定的研究。

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体现出作者朴实的研究作风。在这本书里,曹萌同志所使用的方法,以及所表现的治学风格,还是继续着他在南开大学学习时所把握和继承的南开大学学术传统作风:研究上的重描述和说明;论析上的谨慎而简约。因而书中很少通过臆测和推断去进行结论,更多的是在大量的事实和客观描述与说明中,让结论水到渠成地表达出来。如第十章对《三国演义》的反衬手法与关羽性格嬗变问题的分析,就很自然地得出了该书具有人格教育的思想倾向,以及从对《水浒传》的创作思想基础的描述和说明中,得出该书就思想倾向的根本性质言,是中国古代尚游侠审美思想的遗传与变异,还有,在讨论明末自传体笔记小说的过程中,所得出的中国古代士人的自传与这一文体的继承关系之结论。

《明清小说的文化批评(明代卷)》的第三个特点是引证广博。即

作者并不单单从文学的角度研究小说,而是将小说文本或小说理论表述方面所体现的问题与现象放在大的文化背景上去分析和考察。这就使得本来并不孤立的小说现象被还原到它原来生存的客观实况中,使它与方方面面的条件和因素有了更广泛的联系,从而对它的考察也就作到比较全面和客观。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据实而言,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和现象决非凭空而来,它们都与特定的文化传统、与其所发生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潮、士人生活风貌,以及士人心态有着或密切或不甚密切的联系。这就需要学者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必须作一些剥茧抽丝的工作,没有这样的过程,就不可能有学术上的真知灼见。所以广博的引证在研究中并非是一种特点,有时更主要的还是一种学术的要求,在这里,曹荫同志达到了此一要求。

本书的最后一个特点是作者认真谨严的治学态度。此书中作者每当对特定的问题下结论和判断时,总是十分谨慎的;从不妄加断语,尤其是对一些暂时疑莫能明的情况,更是客观地用“似是”或“或许”这样的判断表述。譬如第九章的结语:

在明末近三十二年,其言情小说观历经了三个自然阶段,这些阶段的出现,有小说思想自身发展上的原因,亦有更为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同时也与小说理论家、小说家的思想、心态的发展关联至切。从这三个自然段落的形成与体现中,我们似可了解艺术思想进展的某些深层根据,领悟言情小说观变化的某些复杂原因:第一,一定时期的言情小说观之出现,首先需要有一个理论准备阶段,此一准备过程的出现,既有社会思潮的影响,又有士人心理状态变化方面的根据,同时也与整体的小说理论批评态势密切相关。第二,从对这三个自然段落的分析和描述中还可以看出:一定时期的言情小说思想,在创作中被体现出来与其在理论上被表述出并非同步,但这两个方面最终却能达到一致,从而表现为殊途同归,异曲同工。最后,我们还可得出下述认识:一定历史时期的言情小说观念的形成或发展,虽然与当时社会的诸多文化因素密切相关,但归根结底还是为当时

政治、经济的发展需要所决定。

我觉得这正表现了一个年轻学者的认真和谨慎,也是当今学术研究所应该提倡的态度和作风。

因为《明清小说的文化批评(明代卷)》一书有上述的可读之处,我便诚恳而热心地把它介绍给学界的朋友,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更多的还是凭读者自己去判断。

我年事已高,但学术热忱并未衰减,每见有年轻同志书稿付梓,便有由衷的高兴,禁不住写了上面的话,也以是望于学界同行。

朱一玄

2001年6月于南开大学之寓所

绪 论

撰写本书的目的在于对有明一代的小说进行文化批评,从而揭示出一定的与小说发展、与小说思想发展有关的规律性的现象和理论质素。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做法是:将明代一些有代表性的小说放在大文化背景上进行考察和分析,并在描述和说明一些小说文本的思想倾向、艺术倾向,以及一定的小说理论表现等现象与这一大文化背景各种联系的基础上,尽量做到比较全面、客观地认识明代小说,以便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挖掘出特定的小说文本和小说理论现象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与艺术价值。

这里所谓的大文化背景主要指影响或作用于小说文本或小说理论,并导致这两方面体现出特定小说史现象的文化基础、环境、氛围与因素,主要包括民族文化传统、社会思潮、士人生活风貌、士人心态,以及政治、经济环境、文艺思潮等等。本书所以选择这样的基本思路和做法,是企图在既往小说研究成果和研究层次上作新的研究尝试,即通过更宽阔的背景因素亦即更多的文学外部因素来考察和认识中国古代小说。

从既有的小说研究成果看,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已有较长的历史。这一工作的推进过程,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手段,以及所取得的相应成果,可大体分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小说版本研究。作为基础性的研究,此一方面主要是对于小说版本的考证、辨伪、甄别和认定。它初始于明清时代而盛于现当代。我们在明代沈德符、胡应麟、周亮工,清代顾炎武、赵翼的某些著述里已经见出考证小说版本的端倪,^[1]到现当代,一些学者便展开了这方面的专门性研究。胡适、鲁迅、赵景深、蒋瑞藻、林辰等人都在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代表性作品是鲁迅《小说旧文钞》、蒋瑞藻《小说考证》和路工的《访书闻见录》。其次是小说资料的收集和考证。

如孔另镜的《中国小说史料》、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在这方面,朱师一玄先生的成就最为杰出,他的《中国古典小说资料选编》堪称巨著,已构成一个特殊的著作系列,其《中国小说史论学散论》更将此一研究作为特殊的学科门类标志出来。第三是关于小说文本和目录的搜集和整理,孙楷第《伦敦所见中国小说》、谭正璧等人所著《古本稀见小说汇考》等均是突出的著作,而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汇编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更是其中的精品。第四是赏析、鉴赏类的论文和著作。这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小小说文本研究,其中主要是对于小说艺术的鉴赏、小说思想倾向的评价,以及小说人物形象意义的挖掘。如鲁德才先生的《中国古代小说艺术论》、吴小如《古典小说漫稿》、周维培《古典小说览胜》。此中成果以张师锦池先生的《红楼十二论》为代表;第五是对于小说发展过程的研究,此一研究以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为开端,以一大批中国小说发展史为殿后。胡士莹的《话本小说概论》、南开大学的《中国小说简史》、王恒展的《中国小说发展史》、刘君慧《中国小说史》可为代表。这一层面中还包括一些更为具体的某一类别小说史和断代小说史,如宁稼雨《中国志人小说史》、黄岩伯《中国公案小说史》、苗壮《笔记小说史》、侯忠义先生的《隋唐五代小说史》等;第六是从美学角度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其代表性作品是叶朗的《小说美学》和吴功正的《小说美学》。此外,在文化背景下考察和透视古代小说,对古代小说进行文化研究也构成一个方面。它以黄清泉的《中国小说文化史》、吴士余的《中国小说思维的文化机制》、曹萌的《明代言情小说创作模式研究》为代表。最后的一方面的研究是对古代小说研究的整理和归纳。黄霖先生的《中国小说研究史》堪称代表。从以上的研究层面和其中的成果看,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是随着时间的进展而越来越趋向多角度和全方位的研究,其研究侧重点也逐渐地发生着变化和转移。这样的研究现状实质是呼唤和等待着更新的研究角度的出现。按着这一研究趋势与时代要求,本书确定出在大文化背景上考察和研究明代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这一立意。

从理论意义上说,当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逐渐地进到文本研究层面以后,只有从更为宽阔的文化背景上去进行考察和挖掘,才能对小

说文本产生比较全面和客观的认识,做出合乎历史本来的说明,同时,只有这样做,才可以更为准确地辨别和认定小说文本所包含的思想的、艺术的以及其他方面的价值,而且也只有作到这一点,才能与小说理论和小说批评实行对比和参照,从而使小说研究更为客观与全面。这是本书确定采取这样一个研究角度的思想基础。

二

从大的文化背景上考察和研究古代小说,首先需要有一个考察和研究的基点,对此,我们的主要思路是:将直接或间接影响、作用小说文本产生的主要因素、条件作为基点。它包括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和与小说文本产生密切相关的时代的社会思潮、士人心态、士人生活风貌,以及与该小说产生时的政治、经济背景、文学思潮等因素。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确定上述考察基点时,我们为什么要更多强调与士人有关的内容,如将士人的生活风貌、士人的心理状态,以及士人的人格理想等放在很主要的位置、作为主要的内容?这取决于我们对于古代小说,尤其是明代通俗小说的主要作品均出自文人之手的肯定。关于这样的学术见解,美国学者蒲安迪在其《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台湾学者夏志清在其《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都有过这样的见解。我们引述前者的观点:

在明代中、后期,也就是 15、16 世纪之间所出现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部小说,是最完备的修订本的作者的创作之产物。它们和当时独树一帜的“文人画”与“文人剧”精品一样;其作者是同一批人。也就是说,在 16 世纪,这四部书为其顶峰的文学发展所呈现的与绘画界所持有抱负的画家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些作品,它们的作者基于同一种教养和共同的审美标准,还有他们都是想通过文艺实践来实现自我这样的追求。从此一意义上我们认为这些小说可以称谓“文人小说”它展示了不少可以在文人画中所见到的高雅机智和深刻性,而后者恰恰使这四部书远远地超越了它们脱胎而来的那些通俗资料之上。

蒲安迪在这里所强调的是,这四部15世纪末、16世纪中的小说版本没有一部是崭新的文学创作,都是经历了对原始素材、先行故事和并行的修订本的长期演变而逐渐完善的过程,但是到了明代,这些原始性质的小说或版本,却忽然以一流的作品彪炳于世,而且,从它们的本身所显示出来艺术水准和艺术抱负,以及对社会与文学的责任感,可以推断其作者应该是不同寻常的文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士人。这是一个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推断或结论。

从古代小说发展史上看,到明代的四部经典性长篇小说产生以后,接着就出现了几个内容系列的通俗小说,如:婚恋系列、公案系列、世情系列、神话系列、武侠系列等,其数量非常大。对于这些受前者影响或小说发展本身所带来的小说创作成果,我们也可以比较肯定地说,其中的绝大多数也应该同样是士人阶层的艺术创造,这里当然也包括大量的拟话本小说,即以“三言”和“二拍”为代表的一批作品。

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大都有一个由素材积累、逐渐加工和最后形成较高质量小说文本的过程。这在《古今小说》等书改编《清平山堂话本》既有故事,以及《三言两拍资料》的研究中有非常明确的说明。如果我们肯定截止到明代形成为固定文本的古代通俗小说作品绝大部分出于士人之手,那么,我们也就应该相应地承认这些发展到明代的小说文本,实际上也标志了该作品在漫长、复杂演变过程中是达到了一个质的飞跃阶段,有的则是这一过程最终完成。在这个飞跃性的质变阶段,成为比较固定文本的小说大多将各自的原始故事内容提高到了自觉进行艺术加工或构思的水平。而这样的小说文本一旦达到这一水平,我们即可发现,在它到达这一水平的过程中,大文化背景的影响和作用也起到了甚至与作家主观能力一样的作用。因为在这大的文化背景上,传统文化的影响、其时政治经济生活的情况、当时特定的社会思潮、士人生活风貌、士人心态和审美情趣,以及小说艺术本身的发展程度,都与此达到此种水平的小说文本之构成有密切关系。另外,如果从明代及以后主要的小说成果来反观它们的创作者,我们似乎也可以认为,这些人大都是一些具有特殊的艺术抱负、有自己的认同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士人,而他们的这些

性格或气质上的质素,也有很多是源于这个大文化背景的。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要把考察士人生活风貌和士人心理状态、士人人格理想等作为对小说文本考察的基点之主要内容的根据。

关于在古代小说研究中重视对士人生活风貌、心理状态等要素的考察,并将它作为从大的文化背景上考察明代小说的主要基点之研究实践,我在过去曾作过努力的尝试,这方面的结果就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明代言情小说创作模式研究》。在该书中,尤其是在书的第三章《明末奸情小说的因果式结构模式》研究中,我就很明确地发现,甚至小说的文本结构模式也明显地受到了士人生活风貌、心理状态的深刻影响:明末士人从放纵情欲中觉醒以后,就进入了生活态度转变和生活作风收敛阶段,而描述同类内容的小说结构布局也因此出现了特定的变化,即形成了因果式结构模式。

三

从大的文化背景上对于古代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作考察和研究,我们所确立的另一主要基点是小说文本产生时的社会思潮。从概念的角度说,社会思潮主要就是哲学思潮。这样的内容对于小说所造成的影响在明代已经是显而易见。比如:在研究这一段小说发展史的时候,学界认为王阳明思想作为明代思想史上的一个崭新的开端,而对其时小说有重要的影响这已不算什么新的见解。实际上他所主张的“良知”的自主功能和重新认清“知行合一”等概念都无疑给思维、包括艺术思维开辟了新的途径。以这一思想为核心所形成的社会思潮,就非常直接地作用于其时的小说。具体的例证是:正如一些学者所推断,像《西游记》这样的作品的产生极可能与王阳明的“心学”有非常密切的联系。^[2]另外,王阳明的成圣成贤的思想主张也明显地在当时白话小说的主人公身上留有印记:明代中、后期的大量话本小说中所出现的一批通过个人奋斗天赐良机而发迹,从而伟大起来的主人公,其性格成长过程在很大的方面就是哲学上成圣成贤的文学阐释。可以说,正是这种抽象的哲学理论给描绘形象的叙事体小说提供了认识论的基础和扩展形象思维的引导。到了明代后期,哲学方面的思潮逐渐地接近到诸如对人欲本质的新的探讨,出现

了重新评价道德行为的意义和后果的反传统倾向。也就是我们在本书中所归纳的“反传统,尚人欲,重个性”的社会思潮。这更与其时小说的发展有相依相伴的关系,甚至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说像《金瓶梅》、《痴婆子传》,甚至《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这样的作品的产生,如果没有当时以“反传统”、“重人欲”为核心的哲学思潮的作用,是绝对不会产生的。

明代的这种以儒学与佛、道思想共存的哲学思潮为核心,并给予小说以直接影响的社会思潮,其中的“三教合一”精神,对通俗小说产生的作用更为直接和深刻。它作为16世纪左右的小说及其以后的通俗小说发展的一个思想或思潮方面的背景因素,是在大文化背景上研究明代小说最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

当然,小说所表现和表述的往往不是系统化的思想活动,有时我们只在那里看到一些对于人间社会或人生本身的一种简单的、经验式的认识或观点,但尽管如此,倘若没有社会思潮作其依托,则也不可能表现出这样的思想深度。这一点我们在该书的第十六章明末婚恋小说的推进式结构程式及其成因,以及发表在《北方论丛》2001年6期中的《明末社会思潮与〈红楼梦〉》中有比较详细的说明,读者可以参看。

四

不仅是小说的创作,在小说理论和批评这方面,大文化背景上的一些主要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因为在小说作者或批评家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特定的文学理论和思想主张是与其时社会思潮、士人心态,以及政治、经济形势也有直接的关系。比如明末的小说批评思想与观点。明代末年社会思潮的主导精神可以归纳为“复兴古学,务为有用”,在这一思潮影响下,士人心态的变化是从主观的忧虑国家之破亡转到实际上的救亡,并因此酿成救亡图存为主流的普遍心态,造成此一心态的根因是后金的大规模入侵和明帝国的濒于灭亡。随着士人由忧亡转入救亡的实生活状况。随着当时社会思潮的转变,很自然地出现了文风的转变的情况。这些文化方面的因素作用到其时的小说批评,就使得当时的小说批评表现出两个